

诗化的记忆

SHIHUADEJIYI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思考

李树声◎著

GUANYULISHIYUWENXUEDESIKAO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诗化的记忆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思考

王蒙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诗化的记忆

李树声 著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 北京 ·

从荒漠走向绿洲的步履

——近年来文学评论中提出的几个理论问题

当历史把濒临沉沦的文学从荒漠推向绿洲时，评论和创作一样攀依着生活之树伸枝展叶，遂现葱茏。新时期以来，文学评论虽后发于创作，但它竭力与创作相伴相随，共尝甘辛，以奋斗者的姿态呼唤佳作的问世，传递美的信息，总结和批评了创作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无论从视角的多面性、方法的丰富性和对新的文艺现象的敏感性上，新时期的文学评论所取得的成绩都是空前的。以下择取近年来文学评论中提出的几个理论问题作一点概述和初探。

—

在反映这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社会生活的文学新页上，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形象凸现在我们面前。他不再是为反映某种主观理念而任意驱遣的傀儡，也不再是附属于某个事件而随便涂抹的小丑，他是有灵性的，按着自身性格逻辑发展独立于作品之中的人，他是行动着的，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因而，进入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本身所取得的最具重大意义的突破，主要还不是或不单纯是表现形式上的变革，而是使文学重新获得了它本来应当具有的性质，即开始使文学回到了作为人学的轨道上，使用自己的一切可能去写人，写人的生活和命运，写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内心世界。”^①人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本来就无法割裂开来，文学要反映生活、揭示现实的本质，就必须以社会生活的具体体现者——人为出发点和中心。同时，当一个成功的、生动的“人”从作家的笔底走来时，我们就会清晰地感到，在他的身上必然熔铸着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和当时的复杂社会交往关系中某些方面

的特征。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步履坚实地走进文坛，是新时期文学恢复了现实主义传统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现实主义深化的原动力。展开新时期文学评论的长卷，人们就会看到“人”的形象曾经几度风雨，但他却牢实地屹立在文坛上。这幅长卷还使我们看到在这短暂的几年中，“人”的情绪波动和心境的变化。他是从历史的风沙中走来，从被扭曲与被损害的人到争取自身价值和尊严的人，又发展成有自信力和开拓精神的人。这也是时代对于文学的慷慨馈赠，才足以使文坛上“人”的形象在几年之内就合情合理地完成了这三段令人振奋的转换。

让我们沿着评论者们理性切割的痕迹，访寻一下“人”的形象在新时期文坛上的发展状况吧。正如许多评论赞誉的那样，《班主任》的出现使人振聋发聩。“《班主任》通过两个人物形象，把人们的眼光从神的世界拉回到人的世界。一个是麻木的、失去了人的灵魂的谢惠敏；一个是野性的根本不曾有过人的灵魂的宋宝琦。在谢惠敏和宋宝琦身上，人的本来面目变得模糊不清了。热爱创造性劳动，是人的本性，可是宋宝琦

没有进行创造的任何要求和能力。独立思考，是人作为社会生物的主要特征，可是在谢惠敏身上，这个特征几乎完全看不到了。透过这两个形象，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把人的灵魂扭曲到何等严重的程度。”^②在《班主任》刚刚问世的那个阶段中，评论的感情色彩比较浓重，理性思维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即使这样，有的评论家已经指出，《班主任》这样的作品“在典型人物的创造上开拓了新领域”。作者“以他所塑造的一组独具特点的典型人物，给社会主义文学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形象”^③。这里谈到的“新”还有其他内涵，但我们认为评论者已经看到小说把被扭曲了灵魂的、又是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展示出来，因而评论中赞扬了作品的现实感以及人物形象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还有评论家在概观《灵魂的搏斗》、《神圣的使命》、《伤痕》、《爱情的位置》等一系列在当时被称为“伤痕文学”的作品时曾欣喜地认为：“家庭恢复了它在文化领域中的位置，那么爱情也必然随之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显然，亲子之爱、夫妻之情都是“人”的感情的外射，而且，作者在谈到短篇

小说应当更精炼时提出“但不论怎样短，还是要求写人，创造人物，是一个有感情、有性格的人。”^④在这篇1979年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作品和生活的穿透力。的确，字字血泪，行行伤痕，篇篇洋溢着对恶的憎恨和对爱的渴望，在这些充满了革命现实主义正气的作品面前，评论者怎能不看到对人的启蒙的迫切性，以及恢复人的尊严感和价值观念的重要意义。

当农民这条粗犷的汉子满面愁云地走进新时期文学的画廊时，评论工作者进一步领略了作为文学作品中心的“人”的风采。同时从更深的层次上感受到“作家离不开观察人研究人，作品离不开写人，写人的性格、感情、灵魂”。^⑤作家本身也有着更加清醒的自我意识，高晓声就谈到“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面对着人的灵魂”（《且说陈奂生》）。他之所以能够笔底生花，接连以数篇力作蜚声文坛，评论者认为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创作的聚光灯所集中照射的是人，人的命运。他致力于在人的命运中探求生活的真理，概括深厚的历史内容。”^⑥作者的确以冷峻但又热切的笔触描绘了曾经几十年与他相濡以沫的普通农

民的命运。如果《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漏斗户”主》中的陈奂生都是游手好闲不务劳作的人，或者他们对生活都存有不切实际的奢望的话，那么他们的悲剧命运就不会有如此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李顺大终生劳作就是为了造三间“屋”，1958年刮“共产”风，李顺大预备造屋的木材砖瓦都充了公，尽管这位忠厚笃实的“跟跟派”“肉痛得簌簌流泪”，但他“想到将来的幸福”又觉快慰。当“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夺去了他造屋的材料，他撕心裂肺地呼喊“我的屋啊”。而且，在这里作者不仅表现出李顺大欲抗争而又无力的性格特征，通过人们几次生活命运的转折，活脱脱地描画出这一代农民的精神世界中的光华和阴影，作品不仅满溢着对李顺大、陈奂生坎坷命运深切的同情，而且也使人看到历史积淀在人物身上的沉疴。也就是说，李顺大和陈奂生都没有清醒的人的自我意识，他们没有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两个典型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有着较为广大的覆盖面，但是几十年来他们并没有学会做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许多评论者认为，如果说这两篇力作是作者揭露出极左思潮对生活

底层人们灵魂的戕害，不如说作者已经从涕泪滂沱的“伤痕”控诉中超拔出来，怀着冷峻、深沉、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探究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浩劫时”，想到了“李顺大这样的人也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一点责任”^⑦。

日新月异的时代辉光投进文学之窗时，沉溺在被戕害和痛苦中的新时期文学中的“人”的形象，开始向新鲜生动的社会变革的现实生活迈进了。同时有些评论也及时地对它进行了意味深长的劝诫：“今天的人民群众不但希望认识历史，认识昨天，而且更希望认识现在和明天，不但希望总结‘文革’，而且更希望实现‘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四化’的理想愈来愈变为人们强烈的愿望，而把充满着经验和教训的历史看作实现‘四化’的诤友。……俗话说得好：‘爹妈死了，守三年孝也就过去了’。那么，‘伤痕’文学写三年也差不多可以了，让四化题材逐渐多起来吧！”^⑧历经磨难的新时期文学已经日趋成熟，它不再重蹈“写中心”的覆辙，它要以思考和探索的精神为自己闯出一条崭新的奋进之路。观念形态的变革对于推动社会的前进具有不可估量的

重要意义，反之蓬勃的现实生活也促使观念的更新。当人们总结这场浩劫的历史教训时，看到了“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崇高地位，看到了“人”在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古国中的价值，同时也看到了脱离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重视又谈何文明？谈何“四化”？于是，作为新时期文学走出伤痕的“人”的形象跨进了第二个阶段，它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人的观念、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等一系列问题，并在这条路上进行了不轻松的探索。在短篇小说《啊，人》、《近的云》、《晚霞消失的时候》发表后，引起了评论界的争议，有些文章的观点出现了失误，对作品中不健康的追求，例如抽象的人性观，认为自身的价值高于一切等倾向作了不准确的肯定。我们认为出现这些偏颇都是难免的。从沉沦中崛起的新时期文学本身就携带了一些历史的遗迹，而如今又涉足许多新的领域。如果承认这是一种探求的话，那么就应当对文艺学上的探求与自然科学的探求一视同仁。艺术的探求是一种科学的探求，我们不能把艺术看成是没有个性、没有特征、任人打扮和戏谑的小丑。在最近出版的一本科学家

的专著中把艺术排在科学领域中的重要座次，并认为科学和艺术是同一个母亲的两位姐妹，她们都一致表现在一系列因素之中，“都积极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造，都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心理”^⑩。我们如果能以这种态度对待文学探索中的失误，那么对文学的发展一定是个不小的促进。并且当我们访寻对人的问题探讨的轨迹时，新时期文学是日益成熟的趋向，比如后来对《在同一地平线上》这篇中篇小说的讨论，持续了两三个月之久，《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读书》相继发表了十几篇不同意见的文章。在这些评论中，虽然存在着争持不下的三种意见，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多数评论对作品的看法日趋客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作品的认识价值，同时，也认为作品反映的思想倾向是不可取的。甚至对格调雅致、笔触清丽的小说《迷乱的星空》中那位不以个人功利的成败、前途是否通达来论个人价值的主人公顾志达也作了恰切的评价。评论者肯定了他在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中高洁的操守，同时也认为他那种矫然不群的冷傲也未必可取。

在探索的行列中，我们又看到了像李顺大这样的木讷而笃实的农民形象。这就是《乡场上》的冯么爸。冯么爸当初是“一条狗都不如”“顶没价值的庄稼人”，梨花屯的乡霸罗二娘依仗曹支书等人形成的新的封建宗族势力诬陷任老大，并把冯么爸拉出来作伪证。当冯么爸“眯着眼”“嬉皮笑脸”来到我们面前时，我们对这个身上带着某些阿Q色彩的穷汉失望了。但他却出人意料，光明磊落地为弱者伸张正义，是什么力量使他从贫苦屈辱中解放出来，听听他理直气壮的宣言吧，“老子前几年不人鬼不鬼的，气算受够了！——幸得好，国家这两年放开了我们庄稼人的手脚，哪个敢跟我再骂一句，我今天就不客气！”饱受十年浩劫之苦的农民命运有了新的转机，他们要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要争得自身应有的地位。正如评论者谈的那样：“一席话骂尽了欺压群众、营私舞弊者的恶行，道尽了庄稼人的心曲。这是正在走向精神解放的人的声音，这是恢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声音。”^⑩

是的，中国农民不再是一串无穷的零，他要变成或正在变成真正有价值的实数。在冯么爸这

个独特的形象身上使我们看到不断提高人民的经济地位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伟力。同时我们更看到改变中国经济落后面貌的现代化进程应当与国家体制民主化的改革进程并驾齐驱。在评论界纷繁的论争中，《人生》中高加林这个形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复杂性格内涵的青年农民形象，按照一般评论人物的简单方式，很难得出恰当的结论。有人说他是孤独的奋斗者形象，有人说他是现代陈世美。有几位评论者较深入中肯地分析了这个形象，他们借用一位英国文学批评家的话说，高加林这个形象是一个“圆形人物”。他们认为作者透视整体生活之下的农村，通过高加林这个形象，体现出当代青年农民新的人生追求，他们的思维空间在扩展，已经不安于父辈们古老的生活方式，对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新的需求。尽管高加林在某种程度上把人生意义只局限在个人欲望的实现上，但他的人生追求有着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他积极进取却是悲剧的结局，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农村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封建主义的家族观念的强大阻力，以高加林的微薄之力战胜不了横亘在他眼前的困难，他

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只能以其自身的审美能力向人们显示出一个平头百姓要实现人的价值的艰难性。当然这种艰难性中包容着外在因素的同时含蕴着农民自身因袭的重担。对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的评论，比较明晰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党的新经济政策把因生活所迫流落他乡的小木匠黄秀川唤回到父亲黄志亮身边，黄秀川决心在生养他的土地上施展技艺，办起了木匠铺。没想到向新生活迈进的奋斗之路上，他的父亲成了他不可逾越的路障。他向儿子提出一系列不合时宜的要求：出于同情生活穷困的富宽，他要儿子收下这个“撸生木匠”；出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他用“拉过五十年大锯却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大手”扭下了儿子木匠铺上的定价牌，逼得小木匠不得不再次出走。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是用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手攥住儿子力图掌握自己命运的手。评论者认为，作品“存在着为了宣泄作者道德方面的主观义愤而牺牲了社会冲突孕含着的历史内容的缺点。也就是说，作者在表现他纯洁峻烈的道德感的同时，在某些重要方面稍稍失去了历史感”。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与深刻的历史变革

的撞击中“作家过多地偏向了传统感情的一边”，以至于对小木匠后来的变化使人感到不大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这不禁使人为小木匠捏了一把汗——在如此沉重的历史负载面前，要开拓一番事业将需要怎样的奋争啊。

有人说，自从《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后，知识分子在当代文学中就再也没有直起腰来。事实上知识分子形象早在林道静之前就曾经被指斥过了。这的确是令人不能理解的怪现象：当一个人获得了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知识之后，就好像沾上了永远洗刷不净的脏东西，轻则被当成同路人、团结对象，重则作为异己分子在唾弃和冷眼之下生活。在文艺作品中他们连作主人公的权利都没有，更谈不上在现实生活中起码的人的尊严了。只有在新时期文学的形象画廊中，知识分子才扬眉吐气地跨进主人公的行列，我们从对《罗浮山血泪祭》、《三生石》、《献身》、《啊》的评论中，感受到了一批执着事业、正派清廉的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的悲愤之情。《人到中年》的问世，使许多评论对知识分子的价值有了更真切的理解。有

的评论者说：这篇作品不禁被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人类知识——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到头来竟置她（他）们于这样一种困乏的境地。”这篇作品之所以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代中年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尊严问题。在陆文婷这一形象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全面生活，“她的丰富精神世界，她的苦乐悲欢的命运……从中看到的不仅是医生职业的特点，而且看到的是有个性的丰满性格”。“读者从这里看到了解放后我们党自己所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种新品质构成了陆文婷大夫作为一个人的崇高价值和尊严的基本内容。……谌容在这里的确发出了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吁：请全社会都来关心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这一声呼吁之所以这样有力，就是因为她站到了“应该珍视人的价值”这样一个新的思想高度。

强调人的观念、价值、尊严等问题，不只是体现在对青年、农民、知识分子等几类形象的评论中，而是闪烁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每个角落。如对《记忆》、《深的湖》、《如意》、《北极光》等作